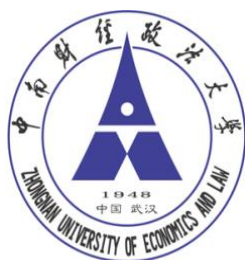


“双一流”建设动态



2019 年第 7 期（总第三十六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发展规划部编

2019 年 7 月 15 日

目 录

【“双一流”建设】	1
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	1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院内部治理的路径分析	7
【高教热点】	11
连 A-学科都不要了，这些大学心气有多高！	11
“快乐”大学早已成“严格”大学？	13
【教师与教育】	15
高校实施大类招生模式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研究	15
高校恶性“抢生源”，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20
从论文看质量：面临崩盘风险的本科教学	23

【国际动态】	24
牛津大学本科导师制的学生学习体验研究	24
美国研究生课堂教学是如何进行能力培养的？	27
【同类高校】	32
相关高校 2019 年法学学科和经济学学科科研产出简要分析	32
中国人民大学部署“双一流”建设中期自评工作	33
中央财经大学召开“双一流”建设中期自评工作部署会	35
西南财经大学召开 2019 年“双一流”建设学科预评估工作会	36
【本校动态】	37
近三年（2016-2018 年）相关学科科学研究热词分析	37
法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签约战略合作协议	39
我校 26 项课题获得 2019 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40
张琦教授首次赴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履职	40

【“双一流”建设】

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

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原始创新能力塑造和综合国力提升，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核心标志。但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投资驱动、申报导向、技术评价、达标意志、拼凑布阵”等学科建设弊端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消除，特别是伴随着“双一流”建设考核周期的迫近，加速高层次人才引进、追求短期速成发展绩效的倾向进一步抬头。发展模式的惯性遗留与非理性博弈叠加形成的路径依赖，亟需得到正视与破解。

一、当前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依赖的主要表现

1. “唯技术化标准”。将各级各类大学与学科排行榜作为学科评价的主要依据，把复杂多样、具有独特规律的知识创新过程与学科建设进程简化为高质量人才、高层次获奖、高水平论文等显性与共性指标要素，没有充分关注到不同国家、区域、学校与学科的差异性特征，较易造成“一个标准”下的同质化建设误区，学科建设与国家原始技术创新能力提升、重大技术需求满足、区域转型升级、高校办学优势传承与特色集聚等存在较大疏离，淡化了学科作为文化与思想体系的独特价值属性，仅仅成为具有世界通用性、可比性的技术工具。

2. “轻体系性能力建构”。当前很多高校把投入巨资、引进高层次人才作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主要突破口，把校内资源重组、田忌赛马排兵布阵作为短期内提升学科竞争力的核心战略之一。对学科方向、学科平台、学科人才、学科思维等体系化、结构化能力建设投入不足，对主导学科与支撑学科的布局优化，学科土壤、学科群落与学

科阳光雨露之间的科学循环关注不足，高层次引进人才与存量人才的磨合、学科环境的切合、学科体系的融合还不顺畅，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一流学科支撑体系与能力建设还存在明显不足。

3. “纯学科视域”。当前一流学科建设还较多地局限在学科建设本身，尚未更多地涉及到高校办学理念优化、办学体系改革与完善等层面。基于一流学科建设的高校管理机制与治理结构仍然有待优化，制约学科交叉融合、跨学科与超学科培育，打通学科与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界限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学科建设对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办学核心功能的牵引作用还不明显，一流学科建设对办学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作用还有待彰显。

4. “弱合纵连横蝶变”。当前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还较多地依赖政府财政投入与政策性资源供给等方式，市场化力量介入明显不足，企业投入与社会支持、捐赠的视野还不开阔、意识还未强化，产教深度融合从产业转化端向技术开发、学科建设端的回溯通道与路径尚不明晰，基于学科建设的产学研一体化体系有待探索。校校合作、校地合作、校企合作、省部合作、国际合作共建世界一流学科的模式与路径有待拓展。

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依赖破解要处理好五对关系

1. “远与近”的关系。处理好“远”与“近”的关系，就是要实现“国际可比竞争力”与“中国贡献”的有效衔接。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要瞄准世界科技与文化创新变革的最新趋势，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一流学科建设的有益经验，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专业评价维度、一流学科建设的可比性指标中“力争上游”，在人类知识创新谱系和世界学科丛林的前沿位置锚定“中国坐标”。同时，要紧紧围绕国家关键技术发展需求、文化竞争力建构的重要领域与关键节

点，精准聚焦、深度嵌入，解决制约发展的重大技术与文化难题，做出一流学科建设的“中国贡献”。

2. “高与低”的关系。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大多数学科建设门类的集中突破。必须集中力量建设若干个发展基础好、国家急需、前景广阔的重点学科门类，以若干门类和领域一流学科的率先突破引领学科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好高阶学科门类与其他支撑学科门类的关系。要着眼于知识谱系的枝蔓结构与学科体系的发展特征，探索学科高与低之间的科学搭配，形成一流学科重点突破与整体学科群实力持续提升之间的合理联动节奏。

3. “内与外”的关系。要建设好一流学科内部的小生态，同时要构建好一流学科良好的外部条件。要重构三层关系，一是学科建设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结构及作用机制，二是高校学科建设本体与企业等市场化要素与力量的关系，三是学科建设与高校人才培养等其他职能的关系。要根据政府管规划、管引导、管规则的基本定位，构建基于知识逻辑的政府干预与投入机制，实现政府介入与学科成长的同轨运行；要注重一流学科与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技术攻关、国家重点企业核心竞争力建构的对位合作，整合高校、企业与市场多方力量，协同进行重大技术攻关，促进技术市场转化反哺，迅速提升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水平；要实现学科建设对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的全面融合与系统带动，构建学科驱动的人才链、创新链与资源供给链。

4. “大与小”的关系。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大”与“小”的关系，要把握好一流学科主体性知识的传承、巩固与创新，在此基础上，注重处在孕育或成长期的新兴知识节点与门类的拓展，积极培育新的学科内容与方向，鼓励带动具有创新性的小学科、新学科群落的成长，通过以大带小，以大育小，实现一流学科及学科体系的不断丰富与成

长，更好地适应时代变迁、文化创新与技术进步。

5. “收与放”的关系。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进程中，要允许合理竞争，鼓励高校充分发挥内部潜力，以良好的学科平台、学科文化、学科制度等获取优质学科资源，实现引育结合，持续提升学科实力。但又要克服简单依托地区差异性财政投入，以经费投入额度作为主要杠杆的“抢人大战”，形成区域和高校间一流学科建设的极化效应，影响学科建设整体生态和发展潜力。教育主管部门在学科评价时对于“引进式”建设绩效要予以适当的除权计量，对于“忽视自主培养、恶意抢人大战”的现象在政策导向与操作层面要予以合理规制。

三、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依赖的破解策略

（一）建立多维度多元化的一流学科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建设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指挥棒，直接决定我国的世界一流学科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建，建成怎样的世界一流学科等基本问题。科学的评价体系要力争做到学术性评价与应用贡献评价相结合、国际性评价和国别性评价相结合、终端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知识专业类评价与泛文化价值评价相结合。

（二）构建基于内生能力生长的学科生态系统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着力点不是若干指标在某一考核节点的“横断”“切面”达标，而是学科体系内部的结构优化，通过学科生态系统建设，促进学科要素的科学流动与优化整合，促进一流学科持续孕育与成长。因此，要构建主干突出、协同支撑的学科群落，在凸显龙头学科竞争优势的同时，要全面加强支撑学科群的建设，有效规避“田忌赛马”式的存量拼凑式发展，走依托学科体系强大促进一流学科建设之路。要实现显性要素与隐性要素的深度融合，高度关注学科文化及价值传承、学科方向及目标凝聚、学科理念创新与制度优化

等深层竞争力建设，以文化内力的集聚激发一流学科建设的深层动力。要建立最适宜激发活力的学科治理体系。要从最大限度激发知识创新活力的目标出发，实行学科内部扁平化、线性化运行体制，科学设立学科管理架构与运行机制，建立学科内部以“学术服务”为基本定位的“小行政架构”，建立与完善学科运行与管理制度、人员聘任制度、成果奖励制度、经费使用制度等系统化制度体系。

（三）重构学科建设行政性力量的传导方式与作用机制

1. 在外部作用机制方面，实现从“线性传导”“微观作用”向“立体介入”“宏观调控”转型。政府性力量与政策性资源不直接介入 学科门类确定、学科团队搭建、学科平台建设、学科管理运行规则设计等微观环节和具体领域，不干预学科生态系统内学科群落、学科土壤与阳光雨露间的结构性关系建构及其运行轨道，鼓励和支持其按照知识创新生长规律和生态系统能量交换与进化原则自主发展。2. 在内部作用机制方面，建立符合知识创新规律，基于知识管理的高校内部管理机制。建立高校扁平化运行机制，构建学校——学院、学科二级运行架构，实现学院与学科统和式管理与运行，削减中间管理层级，实现学校、学院与学者三者关系的综合协调。彻底破解制约学科发展的体制障碍与利益关系壁垒，根据当前学科分化与综合化发展态势，组建跨学科和超学科机构，孕育新兴学科，构建新的学科生长点。

（四）建立基于杠杆驱动的学科建设双连横架构

1. 实现学科建设对高校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文化遗产等的系统化牵引。通过多样化方式，将学科建设成果引入人才培养进程并通过人才培养及办学质量的提升，集聚更多的办学资源，形成更强的办学体系支撑，反向作用于学科建设。2. 强化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与文化创新、技术迭代与社会进步的双向支撑关系建构。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中，要通过产教深度融合、校地产业集群协作等方式，建立市场驱动、技术协同、优势互补、整合创新的学科与产业联动发展机制，形成市场潜力开发、企业创新要素介入、重大技术与文化需求引领与学科建设间的共振效应，加速推进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五）矫正与引导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社会心理及文化心态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心态，会直接影响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社会共识的形成、教育消费潜力的激发、中外高等教育市场竞合博弈格局的演变等。1. 建构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信赖”，要讲好中国学科故事，加强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在海内外推介，构建中国世界一流学科品牌。2. 推介世界一流学科的“多维取向”。在强调国际通用性的同时，引导大众关注一流学科建设与时代和中国发展的紧密契合度，以及由此激发的学科潜力与发展前景，吸引优质学科资源与生源的回流；引导大众科学认知一流学科牵引下的重点大学与普通高校的区分度与关联度。3. 形成世界一流学科三个维度的“社会共振”。一是政府、高校与企业等的价值与使命共振、二是媒介、高校、学科与社会大众的品牌认知共振、三是高校、学科、考生及其技术承接与转化方等微观方对世界一流学科认可及持续性介入与资源支持等，强化基于要素供给、环节优化、体系支撑等微观能力的建设，夯实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基础。

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承载着重要的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使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依赖的打破，将直接引领我国高校学科建设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产教融合深化等。同时这种新的建设理念、改革路径的确立，将在战略层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布局优化、体系完善、发展模式转型、发展动力的持续释放带来深远影响，并催化行业与区域的深度变革与转型发展，架构起教育创新链向文化创新

链、科技创新链、产业创新链、区域发展链传导的逻辑与现实通路。

（摘自《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6期）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院内部治理的路径分析

目前，“双一流”建设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备受关注，各高校纷纷开启“双一流”建设。对于高校而言，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和完善监督机制是提升自主办学治校能力的关键，尤其是加强学院的内部治理。因为学院内部治理才是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重心，是推动“双一流”建设的核心。在此背景下，学院内部治理作为“双一流”建设的核心，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意识到学院治理的重要性，学院逐步获得更多的自主权，但在实践中发现，有效的治理机制及监督机制尚未成型，随之出现了更多的监督盲区。因此，加强大学学院内部治理及监督机制创新迫在眉睫。

一、“双一流”建设的内涵

深刻理解“双一流”建设的内涵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and 世界一流学科的基础和前提。一些学者认为：首先，“双一流”建设要以国家战略目标为宗旨。我国旨在实现高等教育强国，因此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就成为了各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其次，大学精神是“双一流”大学建设的精髓，丰厚的精神底蕴和文化品格是“双一流”建设的隐形动力和内在追求。最后，“双一流”大学建设还须激发办学活力。随着“双一流”建设大幕的拉开，各高校都有必要厘清“双一流”大学建设的困惑，全面分析面临的挑战，从根本上寻找“双一流”大学建设的动力，深入探索并准确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情况、新使命、新机制，从而全面把握“双一流”大学建设的脉搏，充分激发“双一

流”大学建设的办学活力。

当前，学院内部治理是“双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任务。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建设一流大学的关键是建设一流学科，学院是大学内部学科建设发展的重要组织，学院对学科发展建设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着“双一流”建设的效果；其次，学院是学校“简政放权”的主要对象，唯有将“放权”深入到大学基层单位—学院，才能实现“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最后，大学使命是人才培养，而“双一流”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学院作为开展教育教学的基层单位，可有针对性地根据国家和世界对人力和专业的需求，选择性地确定人才培养方向。

二、我国大学学院治理的现状

对照“双一流”大学建设的目标和要求，学院治理目前还存在以下三个不足：

第一，学院的办学自主权非常有限。伴随着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各大学纷纷意识到向学院放权的必要性，逐渐降低学校层级的治理力度，将治理重心向学院下移，激发学院自主管理的积极性。但实际上一些“核心权力”和“管理重心”并未真正到达学院，特别是在人事、财务、科研、教学等方面，这必然影响学院办学的积极性。

第二，书记与院长的权责交叉，导致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制约的失衡。目前，大学学院实行的是党务和行政分工协作的管理原则。在现实中，院长一般都是学术带头人，在本领域很有影响力；书记是既从事专业科研教学又具有党政管理经验的“双肩挑”干部，或者书记是专职管理干部。如果院长比较专注于学术，书记行使的权力较多，包括党委、学术和行政权力；如果院长性格作风比较强势，就形成“大院长、小书记”的局面。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

权力的失衡，会对学院发展带来不良的影响。

第三，欠缺多维协调互动的内部治理和监督体系。上级监督、同级监督和下级监督是完善的监督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如今学院内部治理中的监督尚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体系，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上级监督无暇顾及，学校的纪检监察和审计部门受到人力和时间的限制，无法对学院事务进行实时监督；二是同级监督难以实施，大多数学院由学院副职或办公室主任兼任纪检委员，同级监督基本上形同虚设；三是下级监督意识欠缺，教职工和学生是下级监督的最佳人选，但是通常教职工和学生对学院的事务知之甚少，再加上缺乏监督主体意识，从而导致下级参与学院治理和监督的渠道不畅通。

三、学院治理的实现路径

随着学校逐步下放办学自主权到学院，在建立健全制度的保障下，学院各主体应该明确职权和责任分工，各司其职，共同参与治理，才能实现“双一流”建设学院治理的预期效果。主要实现路径如下：

第一，扩大学院办学自主权。“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管理重心的下移是一个显著的趋势，从政府放权到大学、从大学下放到学院。但实际上，一些“核心权力”和“管理重心”并未真正到达学院，如人事、财务、科研、教学等，这严重影响到学院办学的积极性。对照美国大学，在学校宏观监管下，各学院拥有教学、科研、人事、财务、物质资源等多方面自主管理权，如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学校章程中明确了学院作为基层办学的主体地位，学院内部的行政体系与学术体系相得益彰，共同商议学院的人事、教学、财务等重大事项的决策，体现权力充分下放学院的治理特点。因此，我国大学应积极采取措施落实简政放权政策，而不是把放权当作一个口号空喊，使学院真正拥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第二，建立健全公开的学院规章制度。目前，我国大学已有的内部管理制度尚不能有效地对学院层级的权、责、利进行明确、合理分配。随着学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权力滥用的现象有可能出现，更有必要在学校制度框架下，建立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作为依据对学院内部权力运行进行管理和监督。以密歇根大学为例，大学章程涵盖学院治理的制度规则、权力分配及操作程序等，明确了行政管理者、教师、学生等群体的权责关系，也对学院各委员会的责任与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同时，提出学院对各项事务的决策要采取公开的方式，使全院教职工享有知情权及监督权，保证学院所有人的相关利益。

第三，采取内外共同治理方式。大学共同治理主要强调学院内外部主体的共同参与。国外大学治理模式是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利益相关者有政府官员、企业、校友、教授和学生等。美国大学的治理模式是董事会、行政人员、教职工和学生四个相关利益群体共同参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董事会成员由州长在州参议院的授权下遴选产生，州长或副州长、校长通常是董事会成员，其他成员有地方法官、企业家等。这些政府官员及企业家的加盟，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我国大学的治理与国外有很大不同，是基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管理体制。但我国学院治理，可以更多地吸取国外大学共同治理的精髓，来实现学院治理中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为主的三元权力结构共同治理的目标。

第四，建立明确权责分工的监督机制。问责制作为监督手段，实现权力与责任合理配比与制约，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促进学院的健康发展。把问责制作为学院内部治理的监督手段，是从预防的角度实现了权责统一，以确保管理目标的实现。学院内部问责可包含课程与教学、学术与科研、教师与学生、学院学术和行政组织机构运行质

量等内容。实施问责的途径可把原来主要针对学校层面的内部审查、内部评估、内部审计及自愿问责等用于学院。因此，问责制也是对学院科学研究、教育教学质量和日常行政管理进行监督的有效机制。

随着我国大学治理机制改革的深入展开，很多研究型大学开始探索下放部分办学自主权给学院的模式，大学内部治理在学院层面将会有更大的运行空间。研究者应进一步关注相关改革动向，随着新的学院权力运行机制的完善，将学院内外部监督纳入到大学整体内部监督机制中来。

（摘自《北京教育》2019年7月22号）

【高教热点】

连 A-学科都不要了，这些大学心气有多高！

国家学位委员会公布了 2018 年我国高校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高校原来都是想尽一切办法增设学位点，并以学位点多少论英雄，在学位点方面多多益善。原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申请下来的学位点，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主动销号了，这些大学是如何想的？细细研究，有些情况让你吃惊。

一、办学要求变了——以前盲目追求规模，现在一心一意追求质量

前些年中国高校片面追求规模，合并、升格、改名成风。这种大而全的做法，20 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弊端不小，特别是大而不强，办学效益低下。“双一流”建设要求的是质量而不是规模，要建的是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或是学科，而不是世界一流大规模大学或是学科，

这就有效扭转了重规模、轻质量的风气。在学位点调整中，一些大学自觉缩减规模，突出重点，从而主动裁撤一些学位点。

比如，北京大学撤销了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位和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北京大学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排在 B-档，处于 57 名之后。这样的结果，对北京大学来说，根本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因此撤销该学位点。

二、实施发展战略了——聚焦“一流”大学目标，收缩学科战线

许多大学制定了“双一流”建设计划，期待在某些方面而不是各个方面取得突破或保持领先水平。随着“双一流”建设中期考核的临近，许多大学已经积极准备。“双一流”不是终身制，一旦考核通不过，一流学科即被取消。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看有多少学科，而是看有无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即使只有一个学科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也是很不错的。

比如，上海交大的软件工程在第四次学科评估中被评为 A-，办得相当不错，可却也自行撤销了，因为上海交大的目标是到 2050 年建成卓越的世界一流大学，确定“四个聚焦”，在国家航海、制造、信息等重点建设行业 and 关键发展领域中确立不可替代的地位。显然，软件工程未列为战略重点，而且与战略目标有些离散，所以不得不忍痛割爱。

三、水学位太多了——一些学位点实为赚钱项目，有失体面

许多大学用办学收入增加教工福利，办了许多赚钱的项目。比如工程硕士遍地开花，学位含水量极高，实质上是变相买卖学位，授予学位的高校自己都不要自己的工程硕士。此次撤销的 489 个学位点中，工程硕士占了一定比例。比如北京交通大学，一口气撤销了 8 个学位点，7 个是工程硕士。同济大学此次撤销了 6 个学位点，其中 5

个是工程硕士。浙江大学撤销的 5 个学位点，全为工程硕士。撤销这些工程硕士点，对于这些名牌大学来说，没有任何损失，还会提高学校声誉。

四、评估动真的了——为了成绩单好看，主动砍掉鸡肋学位点

学科建设是“双一流”建设的基础。学科建设如何，那是要评估的。学科评估目前采取“绑定参评”办法：同一学科门类中，本单位具有博士一级、博士二级或硕士一级授权的一级学科须同时参评。这就是说，学科评估看重整体质量，如果学科有的方面办得不好，就会拖整个学科的后腿。砍掉办得不好的学科分支，自然可以使评估成绩单好看许多。

有一些高校，一个学位点分散在几个学院，实际上是同一批教师在教，可是招生分散，管理不便，质量不高，于是主动撤销。总的看，在学位点调整中，名牌高校基本是保留强势学科，撤销弱势学科。

（摘自《里瑟琦科教观察》2019 年 6 月 9 号）

“快乐”大学早已成“严格”大学？

近日，河北某高校官网发布公告，称决定一次性清退 75 名学生。其中，23 名同学因已超出最长修业年限，且未达到结业条件被退学；30 名同学因休学年限已超出学校规定的最长时间，且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复学申请而被退学；22 名同学因未经批准连续两周以上时间没有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而被退学。据悉，该校会隔一段时间清退一批学生，被清退的都是没有达到学业要求而被动退学的学生。

清退学生，很多高校皆有之

近两年，不时有高校清退学生的新闻见诸报端。比如，今年 3 月

左右，多所高校对部分硕博生作出退学处理。关于退学，复旦大学某学院的院长曾表示：“对于荒废学业、无法劝阻的学生，学校只能无情操作坚决退学！”这位院长认为，请这样的学生退学，是百余年来中国高等学府的一贯做法，这是对学校教学质量与声誉的维护。实际上，即使在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这样的名校，每年也会有学生因为学业问题而退学。

高校的严格，在各方面都有体现

其实除了上述高校对学生作退学处理的事件，从去年到今年，我们也能从各方面真切地感受到高校的严格。“快乐”的大学已然成为了“严格”的大学？

首先是教育部的一些举措：

● 2018 年 6 月中旬，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表示，中国教育“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的现象应该扭转。

● 2018 年 9 月，教育部下发《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再次强调各高校要全面梳理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淘汰“水课”，打造“金课”。

● 2019 年 4 月，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有关情况。进一步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一次战略行动，是新时代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打造教育“质量中国”的战略一招、关键一招、创新一招，是中国高等教育一次“质量革命”。

各大高校也采取了相应措施：

● 据武汉晚报报道，华中科技大学 2018 年有 18 名学生因学分不达标从本科转为专科，其中 11 人已在 6 月按专科毕业。

● 2018 年 9 月，清华大学发布消息称，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清华大学将为全校教师提供教学过程中课程作业的查重服务，系全国首个对学生课程作业查重的高校。

● 此外，2019 年严苛的论文查重率让很多应届毕业生“瑟瑟发抖”。据调查，部分学校的毕业论文“查重率”从原来的 30%以内降低到 20%，更严格的甚至降到了 8%以下。此外，还有学校增加了重审环节，即对已毕业学生的毕业论文进行质量跟踪监控，一旦被查出高于查重率，将直接取消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教育部及高校的从严治学，严抓学生教育，一定程度上倒逼大学生用心学习，提升自身的学习素质。当然，高校也应采取其他有效的措施，提高教育质量，加强对人才的培养。比如“严把毕业出口关”；同时，从课程内涵建设入手，真正把“水课”变成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金课”；关于毕业论文的指导，高校可以尝试从大一就开始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高校严格把关教育质量，提高大学的含金量；学生在大学志存高远、学有所获，过充实而有意义的四年，这才是中国大学的应有之义！

（摘自《麦可思研究》2019 年 6 月 18 号）

【教师与教育】

高校实施大类招生模式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研究

所谓“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也可简称“大类招生模式”，从现阶段高校的实施情况看，其内涵大致可归纳为：高校在本科招生阶段不分专业，按照相同或相近学科大类（通常为一级学科大类）进

行招生录取，学生入学后先完成1~2年的通识类课程学习，学校再按照相应标准，根据学生兴趣、成绩等综合因素完成专业分流，继续开展专业教育的一种招生培养模式。相对于传统的专业招生模式，大类招生模式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是普通高校招生培养制度改革的理性选择。

一、高校实施大类招生模式的优势

第一，减少考生专业选择的盲目性，增加录取机会以及专业认同感。考生高中阶段忙碌备考，无暇对学校、专业深入了解，教育部于2012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本科招生专业多达506种。在报考阶段，多数考生对专业了解甚少，对自己适合的专业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考虑成熟，容易焦虑且与家长意见产生偏差而引发矛盾。学生经过前期通识课程的学习，可以更全面地认知专业，并结合个人兴趣和特长、就业发展，更加理性地选择大类内的专业继续深造，有效降低填报高考志愿时的盲目性，缓解考生的紧张情绪，利于个性化发展。

第二，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升综合素质。大类招生增加了学生理想专业选择的机会，但学生也必须通过努力，达到考核标准，参加具体专业分流。这也会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人才的培养。此外，大类招生、分类培养遵循“宽口径、厚基础”的理念，学生不仅掌握了本专业的基础知识，而且也掌握了更多知识和技能；同时，通过专业分流的二次选择，增强学生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从而提升了其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

第三，促进高校资源配置整合，刺激竞争，突出高校培养特色。实施按一级学科群或二级学科群进行大类招生后，从制度层面对多学科重组，跨专业课程整合及资源调配形成了倒逼机制，为学科专业结

构的优化调整和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的改革注入了活力,有利于拓宽专业覆盖面,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构建新的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对学生进行综合的教育培养,全面顺应科学技术发展综合化的趋势。

第四,符合高精尖人才的培养理念。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其中,第六条提出“提升一流人才培养与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招生计划、就业反馈、拨款、标准、评估等方式,引导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及时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加强创新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加大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比重。”要真正实现高精尖人才的培养,必须打破传统教育模式的壁垒。大类招生、分类培养,是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一种创新,学生通过大类培养,具有“一专多能”的创新、复合型人才的特点,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需要。

二、实施大类招生模式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一,大类招生模式纷杂,考生了解不充分。已开展大类招生的高校具体模式不同,即使在招生目录中使用相同的大类名称,但其中包含的专业名称可能不同,甚至有的专业名称和招生大类名称不太相符,而具体的专业分流方式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虽然较普通专业招生,大类招生已经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考生志愿选择的盲目性,提供了二次选择专业的机会;但由于部分考生缺乏充分了解,而高校对于大类招生的详细内容宣传也有限,考生在选择大类时仍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第二,部分高校施行大类招生存在一定的盲从性。自2001年北京大学率先施行大类招生以来,各高校陆续开展大类招生,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高校间相互学习、效仿的现象。但一般来说,具备一定招生规模、学科相对齐全、师资力量完备、管理体制健全的高校更适合

推行大类招生模式；招生规模小、专业数量少或转专业政策相对宽松的学校，开展大类招生无法体现二次专业选择的优势，推行意义不大。

第三，学校的管理存在一定的难度。大类招生模式对于高校的综合管理能力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挑战。涉及跨学院大类招生的高校需要合理整合学院间的各类资源，存在一定的管理难度。不仅涉及师资调配、课程安排等教学、日常行政的安排，更涉及跨学院学生管理问题。在大类招生、二次专业分流后，学生班级须重新组建，学生对新班级归属感不强，有些高校分流后按照新专业和班级重新调配宿舍，加大了学生管理的难度。

第四，冷热专业发展不均衡。考生入校后在专业分流阶段，由于对大类下的各专业了解不够，加之学校缺乏正确的引导，仍旧易出现专业选择的扎堆现象，加剧了各专业间的“冷热不均”，也易导致专业间资源不均衡。各高校因历史背景、学科建设、办学特色等具体情况不同，同一所学校内也存在强、弱专业，如过度考虑所谓的“热门专业”，不利于学校原有的特色、传统专业的发展，甚至于影响高等教育的学科布局。

第五，分流方式制定不科学，难以体现教育的公平性。从专业分流人数角度看，一般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严格按照固定专业人数进行分流，按高考及在校成绩进行安排，类似高考录取的“分数优先原则”；第二种模式是充分尊重考生兴趣选择，类似于“志愿优先原则”，不看重各专业人数的均衡，此种方式对高校的综合实力要求较高。如分流方案制订不合理，加之受人情因素影响，容易出现“内部操作”“走后门”等不良现象，可能丧失人才选拔功能，乃至影响教育的公平性。容易引发学生对学校的信任危机，人为造成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矛盾。

第六，制度建设不健全，资源配置不到位。大类招生模式中的另一个关键环节是培养方案的制定。由于高校将精力更多地投入专业分流方案中，很容易忽视培养环节。师资力量、课程安排等是培养方案的直接体现，如果只是把原有基础课程单纯合并，就容易变成一锅“乱炖”，加之其他教学、管理制度等配套措施不到位，人才培养质量无法保证。

三、实施大类招生模式的对策建议

从整体实施效果而言，大类招生、分类培养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但在推行中也存在诸多现实问题有待完善。

第一，探索适合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虽然大类招生模式在我国已探索了十余年，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也并非所有高校所有专业都适合采用大类招生模式。应根据各高校实际情况推行，以免中途折返。高校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本校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对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就业情况、师资队伍及管理体制进行论证；分阶段、分步骤推行大类招生，可在部分专业开展试点，遵循“边试点、边探索、边推进、边完善”的原则，最终探索出适合本校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第二，加大宣传力度，使考生充分了解大类招生的相关政策。各高校应加强各阶段的政策宣传，一是在报考前向考生充分介绍本校的大类招生具体内容，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配合高校进行政策宣传，加大对考生志愿填报的科学引导，减少考生志愿填报以及专业分流的盲目性。二是在新生入学教育期间，作为重点宣传内容。三是开展朋辈辅导。通过学长的分享，深入了解大类各专业实际的学习与就业情况，更加顺利开展专业二次分流选择。

第三，制定科学的培养方案，优化课程设置，强化师资力量。大类招生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因而必须注重培养环节。

大类招生的学院必须科学制定培养方案，根据学生特点、学校特色，结合专业发展以及社会需求，对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实践环节、学位授予等环节认真研究。

第四，制定合理的二次专业分流方案，确保公正、透明。一是需要高校充分调研、广泛地了解相关学院以及学生的意见，制定合理的分流方案。二是正确引导学生进行专业选择，并建立监督机制，确保分流过程公正、透明。三是关注分流后学生的心理状态、学习与生活状况，有条件的高校应建立人才培养追踪机制，对于大类培养的学生进行追踪分析，以便根据实施情况动态调整相关方案，不断完善高校的大类培养模式。

第五，建立监管机制，完善配套制度建设。目前，大类招生在我国已推行十余年，但至今并未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都是各个高校自行探索，但推行模式、效果均不一致。大类招生模式是一套制度化的体系，除学科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师资配置、分流方案等主要内容外，还应对学生及学籍管理、辅修及转专业规定等其他相关制度进行思考，并构建综合评价反馈机制，建立灵活的制度，以便及时调整优化相关内容。

（摘自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9 年 6 月 28 号）

高校恶性“抢生源”，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近年来，为何“恶性抢生源”事件屡禁不绝，考生们到底该怎么填？学校又该怎么招？

“神秘的”招生宣讲组

高考考学生，志愿考家长，对于正在招生的高校而言，何尝不是

一场较量。在各大招生咨询会现场，来自不同层级高校的招生老师“摆摊设点”。面对考生、家长，他们提供咨询，而对学校来说，他们“身负重任”。北京某所财经类院校招办老师向记者坦言，往年该校几乎从未派出招生宣讲组，但是由于被上海一所同类型大学“挤压严重”，导致近年生源质量下降，出现了该校在广东省的最高录取分数线，竟然与上海这所同类型大学在该地最低线几乎持平的现象。他们被逼无奈，不得不组织十余个招生宣讲组，奔赴重点省份进行招生宣传。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加上国外高校在华招生的冲击，在日益国际化、激烈化的高等教育竞争中，优质生源越来越稀缺。曾长期从事招生工作的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楼世洲发现，争抢生源的学校一般实力相当，抢到好生源，一方面可以提高生源整体质量，另一方面，能够维系大众对该学校实力的认可度。

“明枪暗箭”只为“招到好学生”

6月24日，广东高考成绩公布的当天深夜，间隔不到15分钟，广东省理科成绩前五名考生苏亮的家人就接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招生组老师陆续打来的电话。记者联系到正在浙江省进行招生的某名牌大学招办刘老师，“这几天跟上了发条一样，非常忙，根本没有休息时间”。她向记者透露，“按照全省高考的排名，我们会根据往年我校招生情况，跟考生们一对一分析，他们报考我校心仪专业上线的可能性。如果分数足够，我们会口头许诺，以打消他们的顾虑，让他们放心填报。”“浙江大学用巨额奖金吸引考生只是常见的手段。而明枪易挡，暗箭难防。”刘老师还向记者透露了更为隐蔽的手段，“很多招生人员都会冒充他校招办人员编造谎言，发信息、打电话告诉考生，今年填报该校的意愿考生增多，无法满足考生就读心仪专业的要求，告知他不要填报这个学校。

事实上，每年高招之前，教育部都会提出严肃的纪律要求，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往往难以控制。东北师范大学教授秦玉友认为，但是，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名校选择生源基于学业表现、学术潜力与综合素质的标准，也违背学生选择名校出于自己学术表现、专业兴趣与综合素质的标准。长此以往，越来越多的高校会“被胁迫”参与到这种恶性竞争中来，严重影响正常的招生秩序。

从招“分”到招“人”

6月16日，汕头大学决定将以2019级至2022级本科生为对象，实施本科生学费全额奖励计划，该计划是李嘉诚基金会捐资在汕头大学设立的专项奖助学金。有人认为这是利用“新生高额奖学金”抢夺生源的做法。但是校方认为，“恶性抢生源”针对的只是高分生源，而又过于强化“唯分数论”，其目的是“抢”高分学生。汕头大学这一举措并不是针对高分学生，而是面向所有考生，与“恶性抢夺生源”有本质区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谢小庆表示，今天，需要警惕的不是“抢生源”，而应该反对以“唯分数”的方式抢生源，鼓励以多元评价的方式抢生源，鼓励通过科学、可靠、有效的评价手段抢生源。

“从理论上讲，报考过程应该是一个学校与家庭共同为考生获得相对最优的发展机会的过程，不是一个让家长 and 考生因短期物质利益而在学校上做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过程。”秦玉友建议，高校应该通过展示整体实力、办学特色与学校声誉来吸引考生，通过客观、系统、全面的招生宣传，准确地向考生传递学校各专业的信息，让家长与学生在信息比较充分的条件下做出相对理性的选择。“实际上，高考招生更考验高校的能力。”

（摘自光明微教育 2019 年 6 月 30 号）

从论文看质量：面临崩盘风险的本科教学

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存废之争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在坚持派、废弃派的激烈争论中，教育主管部门选择了不断强化毕业论文权重的决策。然而，这种决策巨大压力下产生的毕业论文，质量到底如何，想必每个审阅过本科毕业论文、参加过本科毕业论文答辩的老师都有过亲身体会。其实，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标准来评价本科毕业论文，真的有点抬举大学生了。更为痛心的是，即使这些毫无使用价值的论文，还是多少导师手下硕博士助战、老师亲手操刀提携、学生过度“引用”N多材料后的产物。

登录一些学生论坛，到处可以看到学生吐槽毕业论文太难、不知如何下手的议论；虚拟空间上不乏有偿代写本科毕业论文的小广告，吸引成千上万论文写作困难的毕业生关注；大学生因本科毕业论文不过关以各种方式自杀的新闻也不鲜见。而毕业答辩现场，指导教师痛斥本科生论文质量低下的视频，也被众多媒体转载。上述所有反常现象其实说明了一点：大学本科教学质量太烂了，烂到连最基本的毕业论文要求都难以达到。那么，在本科教育质量如此低下、大部分本科生实际上已经难以完成最低要求的情况下，当前仍然坚持甚至强化本科毕业论文要求的唯一动机，只能做如下解释：本科毕业论文已经成了防止本科教育质量崩盘的最后一道拦河坝。

其实，如果仔细分析高等院校最近几十年的历史轨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点也不难理解。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本是教书育人的象牙塔里，教育的主体——老师和学生都已经放弃了主业。教师忙着争帽子、发文章、抢课题、捞外快，学生忙着网游、拍拖、社团活动、社会兼职。偶尔遇到几个热心教书育人的教师，遭遇了N次大多心不在焉的学生的不良互动后，心灰意冷。偶尔几个一心向学的

学生，遭遇了忙于“四唯”的老师冷脸后，也开始随波逐流。于是，主业不兴、副业兴旺，成了大多数高校中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和学生的共同特征。

然而，用毕业论文这样区区的一道临时构建的大坝去防止本科教育质量低下这个堰塞湖的垮坝，其实风险很大。原因有二，教师厌教、学生厌学这些驱动因素不能消除的情况下，教育质量低下的堰塞湖水位不断上升；毕业论文大棒压力必须持续增强以防止垮坝，这种消耗巨大资源的高压下的动力恐怕难以持续维持。如何将教师的注意力转移到教书育人，如何使学生的主要精力转移到学习，这才是防治本科教育崩盘风险的治本之策。

（摘自双一流高效 2019 年 6 月 10 号）

【国际动态】

牛津大学本科导师制的大学生学习体验研究

建立于 1167 年的牛津大学是享誉全球的世界一流大学，它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具有浓厚学术精神的“导师制”教学传统。1922 年，英国皇家委员会（The Royal Commission）将导师制视为牛津大学的核心特征。“导师制”至今已有 7 个世纪的历史，目前，牛津大学的导师主要从事教学活动与科研活动，在本科教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研究采取质性研究中的案例研究方法，通过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选取了牛津大学 28 位本科生进行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得出以下研究发现：

（一）牛津大学本科导师制的实施路径

牛津大学本科导师制与其他大学的导师制相比，最根本的区别体现在性质与规模两个方面。在性质上，牛津大学本科导师制本身便是教育教学系统中主要的构成部分；在规模上，牛津大学本科导师制以3~4位学生为平均单位，具体而言，牛津大学本科导师制的实施路径分为辅导前、辅导中与辅导后3个阶段。

第一，辅导前阶段。在辅导前阶段，学生会根据导师制定的研究主题与相关书目进行大量的阅读准备，撰写自己的读书笔记。第二，辅导中阶段。学生需要在与导师见面前的24小时将自己的读书笔记以邮件形式发给导师，然后学生按照导师既定的时间与地点，带着自己的读书笔记前去与导师面对面交流。根据人数的限制与导师的安排，有时候是一对一进行针对性指导，有时候是多对一进行小组指导。第三，辅导后阶段。辅导后阶段，导师会根据学生特点、专业要求、学习效果等因素及时反思与修改教学计划，制定下一次的研究主题及阅读书目，并提前1周以邮件的形式发给学生。这个阶段是导师制指导单元的结束，也是下一轮指导单元的开始。

（二）牛津大学本科导师制的目标内涵

根据访谈的结果，牛津大学本科生对导师制目标内涵的体验可以归为4种，分别是：类型一，帮助学生解疑答惑；类型二，引导学生习得深究知识的方式；类型三，培养学生在宽广学科背景下审视问题的能力；类型四，实现师生之间观点的碰撞与新想法的生成。这四类目标内涵的区分是依据学生在辅导前阶段的知识准备情况、师生在辅导中阶段表现的知识交流特征以及学生在辅导后阶段取得的知识训练结果来划分的。

另外，参与研究的28位学生对自己的导师制目标体验归类中，

有 8 位学生属于类型一、10 位学生属于类型二、7 位学生属于类型三、3 位学生属于类型四。其中，人文社会学科在四种类型的分布较为均质，而理工学科集中分布在类型一与类型二。由此可见，牛津大学本科导师制较为灵活地运用在不同学科中，从而最大可能地促进学生的学术成长。由于研究被试数量的限制，无法进一步探讨不同目标类型下导师制的运用与具体学科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结论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牛津大学本科导师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导师的个性化指导方式。牛津大学本科导师制强调以学生为本，关注学生的兴趣与发展动态。导师会根据每位学生的读书笔记，面对面与其进行深入交流，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循循善诱地培养学生看待事物的多元化角度。

第二，平等包容与权责清晰的师生关系。导师与学生的常规化辅导，确保了师生教学范围内充分享受自由包容的学术空间。这种自由空间克服了本科生课程制下属于教务处的各种制度束缚，给导师与学生提供了育人创知的强大学术生命力。同时，这种自由且严谨的氛围清晰了导师制的师生权责界限、保障了学生受教育的权利、杜绝了师生间的利益冲突隐患，让师生之间的关系纯粹而平等。

第三，重视原著阅读的研导内容。无论导师在具体的教学指导过程中是帮助学生解疑答惑、引导学生习得获取知识的方式、培养学生在宽广学科背景下审视问题的能力，还是最终实现师生之间观点的碰撞与新想法的生成，导师制的前提是学生必须阅读大量的文献，尤其是原著。这些知识量变的过程最终促成辅导过程中能力的质变，从而使学生不仅习得了知识，而且也养成了自主学习与思考的习惯。

第四，多元背景的同伴影响。目前，牛津大学共有 39 个学院、

16 个学部以及若干个中心与研究所。学院是学生生活的组织单位，而学部是跨学院的学术研究机构。同属一个学部共同研讨学习的学生，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学院，共同生活于同一个学院的学生也完全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同一位导师的课程中有来自于不同学院或者不同学部的学生共同选修。因此，这些学生自身带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与思考角度，在导师制的纽带下共同探讨学术问题激发头脑风暴。这种同伴相长有利于打开学生的知识局限，形成跨学科、跨文化的认识体验。

（摘自中国教育财政 2019 年 6 月 19 号）

美国研究生课堂教学是如何进行能力培养的？

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以其一流的研究生教育质量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学子们。这些大学是如何利用课堂教学进行能力培养的呢？本研究以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学院两所著名研究型大学的教育学院专业课为例，来分析这一问题。

教师教学理念：以能力培养为重心

教学理念是教师关于教学目的、方法、模式等的本质性看法，是教学行为背后的支撑力量。在参与课堂观察过程中，笔者与任课教师们进行了直接对话，了解其教学理念。美国教师们普遍认为能力的培养才是研究生课堂教学的根本目的。这其中提到最多的是思考能力，其次是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是语言表达能力、合作能力和独立学习能力等。例如：C 课的主讲教师指出：“我课上一般不会直接讲解知识内容，但我一直围绕学习内容与学生探讨，引导他们思考，让学生一直处于思考状态比什么都重要。”

教师们重视能力培养的理念与美国实用主义国家哲学和文化背景、现代信息社会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以及大学领导者的强调和倡导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教师们理念上的重视是进行能力培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重视能力培养的理念，是难以在课堂教学实践中真正鼓励和引导学生发展其各种能力的。

课堂时间分配：向能力培养倾斜

美国研究生一次课堂教学通常是 150 分钟，其中有 10 分钟休息时间，有效教学时间大概有 140 分钟。那么，这 140 分钟的教学时间在知识讲授和能力培养之间是如何分配呢？根据对 6 门课一学期的教学现场观察记录，A 课是讲授知识时间最长的，每次课大都在 30 分钟~40 分钟之间，占总体教学时间的三分之一左右。主讲教师通常将理论知识以简单的语言总结在 1 页~2 页纸上，快速讲解一下。剩下 100 分钟~110 分钟的时间，教师主要是围绕知识点，让学生练习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培养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可以看出，美国教师将大部分的课堂时间都用来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这种向能力培养大幅倾斜的时间分配虽然可以细致地引导学生发展各种能力，但其前提是学生必须在课前认真阅读材料，提前自学理论知识，否则很难使课上的能力培养达到预期的效果。

教学内容设计：重视知识应用练习

对教学内容进行精心设计是美国研究生课堂教学的突出特点之一。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重视理论知识应用练习的设计。教师常用的设计包括实际案例和情境练习。例如：F 课的教师则经常设计情境，让学生根据情境实际表演解决问题的过程。学生通过表演不但真正理解了竞争在道德培养中的作用，还锻炼了运用这些知识与他人进行沟通，并说服对方的能力。

美国研究生的教学内容设计扎根于社会实践，又由教师根据教学目的进行加工提炼。这不但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为能力培养创建了良好的情绪条件，还通过学生实际参与和体验，操练其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在理论知识与社会生活之间建立联系，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增强问题意识。

学生课堂参与：构建多样化互动

美国教师非常重视学生的课堂参与，尤其是同学之间的互动，会采用各种形式促进学生参与到互动中，具体说来，有五种形式：第一，固定小组互动，即互动在固定的小组成员之间进行。第二，邻座互动，即让学生与自己座位前后左右的同学进行互动。第三，“鸡尾酒会”法，即让学生带着问题，随意互动。第四，激发持不同观点学生之间的互动。第五，教师们还通过网络等信息技术促进学生进行课前互动。

构建学生之间的互动，给予每位学生充分参与教学的机会，有利于挖掘不同学生的知识背景，形成思想碰撞，激发其探索的热情，训练学生的思考能力，还可以促进其相互了解，培养其包容和尊重不同观点的性格及平等合作的团队精神。

教师课堂作用：引导学生思维活动

美国研究生课堂教学尽管学生参与度高，在形式上看起来散乱，但实际上是“形散神不散”。这里的“神”就是教师的引导作用。教师一直通过课堂所有活动的设计和实施，引导着学生在课堂上所有的学术思维活动。例如：在E课上，小组成员全部上台主讲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在学生讲解过程中，教师适时地给学生抛出问题，引导其聚焦到关键问题，并进一步拓展其思路。

教师这种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的形式其实并不新鲜，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运用的“产婆术”就是如此。运用这一方法需要教师学识渊

博、逻辑清晰、思维敏捷，善于抓住学生发言中的闪光点和与讨论主题的关系，不断进行追问，将对话引入更深的层面。教师的引导让学生散乱、肤浅的思路具有了逻辑和深度，对培养学生高级思维能力和逻辑表达能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对我国研究生教学的启示

通过对美国波士顿地区大学六门课程课堂教学的观察和分析，可以看出其在培养学生能力方面有着许多独特的做法，这给我国研究生课堂教学带来一些启示：

一、教学理念上：教师应认识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美国研究型大学教师将知识传授看作是课堂教学的前期基础，而将能力培养作为课堂教学的终极目标。为此，在课堂教学中只讲述知识的主要内容和关键点，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对学生进行各种能力的培养。我国教师普遍将知识传授看作是课堂教学的主要目标，“重视知识的继承，忽视研究生问题意识、批判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更忽视实际运用这些理论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生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具有各种重要能力的高层次人才。知识传授只是能力培养的前提和基础，能力培养才是研究生课堂教学的重中之重。为此，仅仅止步于知识传授的课堂教学则是不完整的教学，是没有达到研究生教育目的的教学。

二、加强教学设计，重视知识运用练习的方法

由课堂观察可以看出，美国的研究生教学具有很强的设计感，而设计的重点则是知识运用的练习。在设计练习方案时，教师们运用多样化的创意活动来吸引学生，帮助学生将抽象的知识与鲜活的社会生活实践联系起来，达到培养学生各种能力的目的。我国研究生课堂教学在设计上较为重视知识内容的准备，缺少知识运用练习方法的设

计。实际上，我国研究生课堂教学中同样也会涉及现实生活中的素材和问题，但教师们在运用时，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较少进行精心设计，特别是具有创意的设计，难以给学生提出实在的问题，也难以为学生创设模拟社会现实又具有能力培养意义的问题情境。

三、加强教师引导作用，提升学生参与的质量

在美国研究生教学中，学生课堂参与的质量较高。这主要表现在学生参与的形式多样，参与面广，而且深度参与。美国学生参与的质量之所以较高主要在于教师引导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我国的研究生教学目前存在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是教师进行“满堂灌”。据调查，我国高校大约有 59.2% 研究生课堂教学仍然采用这种灌输式讲授；另一种是学生进行“满堂灌”，即教学内容完全由学生主讲，教师通常只进行简短的评论。在这两种教学中，教师引导作用都没有充分发挥，从而导致学生参与质量较差。为此，我国的研究生课堂教学的当务之急应是加强教师的引导作用，这既需要增强教师的引导意识，认识引导对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同时还需要提升教师的引导能力，要求教师能够融会贯通地掌握专业知识，勤于思考教学内容，努力把握学生的思维逻辑。

美国研究生课堂教学经验使我们看到了能力培养的复杂性，它涉及到教师理念、教学时间安排、教学内容设计、学生参与及教师引导作用等方方面面。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我国研究生课堂教学在能力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在具体实践层面改进课堂教学、提高能力培养的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

（摘自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9 年 6 月 28 号）

【同类高校】

相关高校 2019 年法学学科和经济学学科科研产出简要分析

一、八所高校法学学科 C 刊发文量分析¹

表 1 给出了 2019 年 5 月 7 日-6 月 4 日近一个月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清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八所高校的法学学科在南大核心期刊上的发文量情况。中国人民大学以 76 篇位居第一，50 篇及以上的高校还有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 14 篇，与其他高校有一定的差距。

表 1：八所高校法学学科近一个月（2019. 5. 7-2019. 6. 4）C 刊发文量

机构	发文量
中国人民大学	76
武汉大学	55
北京大学	53
中国政法大学	50
清华大学	33
华东政法大学	25
西南政法大学	2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4

二、十六所高校应用经济学学科 C 刊发文量分析

表 2 给出了 2019 年 5 月 7 日-6 月 4 日近一个月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

¹ C 刊是指在南大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数据来自中国知网科研评价平台“中国高校科研成果统计分析数据库”，南大核心扩展版不在南大核心统计数据中，数据库没有收录部分南大核心集刊论文。数据采集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7 日-2019 年 6 月 4 日。

东北财经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和江西财经大学共十六所高校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在南大核心期刊上的发文量情况。中国人民大学的发文量为 91 篇，远高于其他高校。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都为 66 篇。共有 9 所高校的发文量超过 50 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发文量为 59 篇，在 16 所高校中排名第 6，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表 2：十六所高校应用经济学学科近一个月（2019. 5, 7-2019. 6. 4）C 刊发文量

机构	发文量
中国人民大学	91
南开大学	66
北京大学	66
西南财经大学	66
上海财经大学	6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59
中央财经大学	5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53
西安交通大学	53
厦门大学	49
东北财经大学	45
清华大学	40
复旦大学	38
山东大学	33
辽宁大学	19
江西财经大学	13

中国人民大学部署“双一流”建设中期自评工作

6 月 10 日，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会议部署“双一流”建设中期自评工作并推进资金执行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常务副校长王利明，副校长贺耀敏、朱信凯出席会议。

刘伟指出，做好“双一流”建设中期自评工作，第一要搞清楚“评

什么”，要对照学校已有的建设方案、这两年“双一流”建设中兄弟院校的先进做法、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要求、现代社会发展新形势新变化，严格把关学校“双一流”建设的符合度、达成度，并对下一步的工作再思考、再讨论，明晰今后的工作目标、思路和抓手，让工作更主动、心里更有数。第二要搞清楚“怎么评”，要根据不同学科特点确立自评标准，认真分析“哪些学科要更多地参考国际标准和做法”，“哪些学科要更多地强调彰显中国特色、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不能简单化、教条化，更不能“一刀切”，要制定好自评工作方案，确保压力传导到位、责任落到实处。第三要搞清楚“谁来评”，“双一流”建设学科各主责单位和各相关单位都要行动起来，形成全校一盘棋意识、学科整体意识，凝心聚力、通力配合做好自评工作，以优异的建设成果献礼建国 70 周年。

王利明表示，此次中期自评是教育部对本轮建设进行期末评估的重要参考，同时也是学校查摆问题、总结经验进行改进的重要机会。要以符合度、达成度、标志性建设成效为重点，通过“单位自评+互评走访+专家评议+集中展示”等多种形式，扎扎实实认真做好自评工作，取得预期成效。

贺耀敏从总体要求、工作要求、材料报送等方面强调了中期自评工作重点，并表示，要认真组织工作开展，以评促建，客观检视建设过程，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提出针对性改进措施，加快发展，力戒形式主义。朱信凯通报了“双一流”建设资金执行情况。他提出，为确保“引导专项”资金执行到位，2019 年学校加大改革力度和提前启动力度，提前半年开展启动工作，认真开展经费执行情况督查，为各单位搞好“双一流”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网 2019 年 6 月 12 号）

中央财经大学召开“双一流”建设中期自评工作部署会

6月21日，中央财经大学召开“双一流”建设中期自评工作（以下称自评工作）部署会。校长王瑶琪，副校长史建平、马海涛出席会议，“双一流”建设与改革工作组成员，学校“一流学科跃升计划”和“一流学科培育计划”相关学科建设学院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王瑶琪讲话指出，本次自评工作既是国家对第一轮“双一流”建设期末验收评估的重要参考，也是学校总结经验、发现并解决问题的重要契机，全校上下务必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头等大事抓紧抓实抓好。一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组织工作开展，客观检视建设过程，全面真实地反映学校“双一流”建设任务的落实情况，对于发现的问题，要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措施；二要突出重点、聚焦亮点、彰显特色，充分展示学校“双一流”建设以来取得的成效和亮点，对于好的做法，要总结经验继续发扬；三要全校联动、协同推进，各职能部门、学院应根据任务分解明确分工，牢固树立全校一盘棋意识，凝心聚力做好自评工作，力争在第一轮“双一流”建设期末验收和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实现新突破。

史建平对学校自评工作进行整体部署。他强调本次自评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各职能部门、学院认真组织开展工作，以评促建，查摆问题、总结经验，确保圆满完成自评工作。马海涛就经济学学科群自评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明确评估的重点是一流学科建设成效，应在准确把握人才培养、学术团队、科研创新“三位一体”学科建设内涵的基础上精心组织自评工作；二是要选取所对标的高校及学科，通过自评认真查摆问题、分析差距、找出对策，以一流学科建设提升

学校“双一流”建设水平；三是要突出建设重点与特色，对照《中央财经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方案》认真梳理和总结学校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凝练学科特色等方面的亮点，加快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

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王红梅介绍了自评工作的具体安排。本次自评工作采取自我诊断评估为主，并结合校外同行专家评估的方式。她对“双一流”建设的符合度、达成度、表现度以及特色发展等自评工作的重点内容进行了阐释，对自评工作的时间安排、评估内容、任务分工等方面的要求进行了说明。

（摘自中央财经大学新闻网 2019 年 6 月 28 号）

西南财经大学召开 2019 年“双一流”建设学科预评估工作会

6 月 11 日，西南财经大学召开 2019 年“双一流”建设中期评估暨学科预评估工作会。党委书记赵德武、校长、党委副书记卓志等校领导、职能部门领导参加会议。

党委书记赵德武在讲话中深入阐释了做好评估工作的重要意义，强调指出做好评估工作是学校的头号工程，是全体西财人的历史责任。一要着眼战略全局抓落实。要强化高点站位、战略定力和忧患意识，立足学校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打基础、抓关键。二要吃透最新精神抓落实。要准确把握国家政策导向、建设要求和学科评估新变化，切实把评估要求转化为精准思路和务实举措。三要坚持改革创新抓落实。要把做好评估工作与全面落实“八大改革和建设任务”结合起来，以改革创新切实推进“双一流”建设。四要力戒形式主义抓落实。要强化“清单式”定任务、“精准化”抓落实、“蹲点式”指导服务，在抓上求突破，在干中见实效。五要强化组织领导

抓落实。学科建设委员会、专项工作组和分委员会、“双一流”建设办公室等单位要各负其责、切实发挥作用，抓好贯彻落实。

校长卓志总结了学校“双一流”建设的主要成绩，从评估依据、主要任务、组织实施、工作要求四个方面对学校“双一流”中期评估工作作出具体安排。他分析了学校学科建设体系，从工作思路、主要任务、工作安排三个方面对做好学科预评估工作作出具体安排。他强调，开展评估是对学校学科建设成效的重要检阅，要全面总结经验，认真梳理不足，进一步明确目标、弥补短板、加快建设，切实增强学校学科综合实力，提升学科声誉与影响力。全校上下要统一思想认识、凝聚智慧力量、同心同向同行。各学院（中心）、职能部门和一级学科建设分委会要切实担负起使命和责任，树立全局意识、明确责任分工、抓实抓好评估工作。

（摘自西南财经大学新闻网 2019 年 6 月 12 号）

【本校动态】

近三年（2016-2018 年）相关学科科学研究热词分析²

一、法学

图 1 给出了 2016-2018 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科学研究的相关热词。可以看出，“知识产权”、“著作权”和“法治”是近三年讨论最为集中的三大主题，词频分别为 40、37 和 29。此外，关于“社会治理”、“法律规制”和“司法改革”也是较为热门的话题。“大数据”一词词频为 13，近些年成为学者们的重点关注领域。

² 数据来自中国知网科研评价平台“中国高校科研成果统计分析数据库”，数据采集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



二、应用经济学

图 2 给出了 2016-2018 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应用经济学科学研究的相关热词。“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和“信息披露”分别以 64、48 和 31 的词频排名前三。对近五年和近十年的热词进行统计分析也可以发现,“经济增长”相关话题一直是应用经济学领域最为关注的问题。此外,“城镇化”、“信息披露”、“营改增”、“商业银行”、“上市公司”和“盈余管理”等话题的关注度也较高。



法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签约战略合作协议

7月6日上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常务副总编王利民，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喻立平，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社会科学部主任李树民莅临出席；学校副校长姚莉教授、法学院院长等老师到场参加。

姚莉副校长介绍了学校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所取得的成就。她强调，法学院双一流学科建设正处于紧要关头，法学院将团结一心，做好应做的事，不辜负诸多期望。喻立平书记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出发，提出合作、创新和利用各方面社会资源等路径。他表示将大力支持我校学科发展建设，希望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可以加强对湖北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

王利民副总编与徐涤宇院长签署了法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战略合作协议。签约过后，王利民副总编在发言中高度肯定了法学院的实力，指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既是高端成果的发布平台，也努力成为人才汇聚的精神家园。关于高端成果的传播，他指出杂志社具有选题讨论等学术生产的前端机制，也具有知网、数据库、新媒体、海外平台等后端机制，致力于实现前中后三端优势整合。他强调杂志社将进一步完善生产机制和传播机制，使学术成果更具可持续性。

（摘编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新闻网 2019 年 7 月 10 日）

我校 26 项课题获得 2019 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2019 年 7 月 12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布 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结果。我校有 26 项课题获准立项，其中重点项目 3 项，一般项目 18 项，青年项目 5 项，立项经费 565 万元。

总结 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及立项结果，有以下特点：1、申报数比去年有增长：共申报 134 项，比去年多 1 项；2、立项率：今年为 19.4%，比全国平均立项率 15.7%高出 3.7 个百分点；3、排名：居全国财经政法类高校前列，湖北省第 3 名，全国排第 28 名；4、重点项目立项率有提高，比去年增长 50%；5、涉及学科有增长：共涉及 13 个学科领域，比去年增加 2 个学科，具体是：马列·科社（1 项），哲学（1 项），理论经济（2 项），应用经济（3 项），统计学（1 项），政治学（1 项），法学（7 项），社会学（1 项），人口学（2 项），中国历史（1 项），外国文学（1 项），语言学（1 项），国际问题研究（1 项），管理学（3 项）。

（摘编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新闻网 2019 年 7 月 15 日）

张琦教授首次赴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履职

6 月 17 日至 6 月 21 日，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Sector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PSASB）在加拿大多伦多市 IPSASB 总部召开理事会和咨询顾问委员会工作例会。我校会计学院政府会计研究所所长张琦教授作为来自中国的首位咨询顾问委员会（Consultative Advisory Group, CAG）的委员，出席了 CAG 工作例会，并列席了 IPSASB 理事会，在政府会计的国际平台上发出了中国声音。

会议期间，张琦教授介绍了中国政府会计改革的实践过程与实施情况，分享了中国政府会计改革实践的措施和经验。CAG 主席 Thomas Müller-Marqués Berger 表示，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改革在各国都面临着多重挑战，在准则制定层面考虑实践可行性是 IPSASB 以及 CAG 现在和将来重点关注的问题，中国政府会计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探索。

此次会议是张琦教授 2019 年入选 IPSASB CAG 委员会后的首次履职，也是作为来自中国的首位 CAG Member 首次参加 IPSASB 的工作例会，在政府会计的国际平台上发出中国声音。通过会议和交流，张琦教授参与了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紧密跟踪最新国际专业动态，与全球从事政府会计研究与实践的学者和实务专家进行了高质量的讨论和交流，推进了政府会计研究的国际化发展，为建设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专业智库平台提供了战略机遇和实践条件。

（摘编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新闻网 2019 年 7 月 2 日）

主 编：高利红 雷 磊

责任编辑：黄容霞

编 辑：孙锦锦 刘金萍

报 送：教育部、教育厅相关处室

交 流：兄弟高校相关部门

呈 送：校领导、全校各单位负责人

2019 年 7 月 15 日

本期共印 150 份
